

當代中國思想界

國是 訪談錄

瑪雅 著

當代中國研

港台書

當代中國思想界

國是 訪談錄

瑪雅 著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



當代中國研究叢書

責任編輯 姚沙沙

美術設計 鍾文君

叢書名 當代中國研究叢書

書名 當代中國思想界國是訪談錄

著者 瑪雅

聯合出版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1065號1304室

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

香港九龍塘聯福道34號

香港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3字樓

印刷 深圳市恆特美印刷有限公司

深圳市寶安區龍華民治橫嶺村恆特美印刷工業園

版次 2009年9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格 16開（170mm × 245mm）328 面

國際書號 ISBN 978-962-04-2863-0

© 2009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in Hong Kong

本書原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以書名《戰略高度》出版，經由原出版者和作者授權，並經作者修改由本公司在除中國內地以外地區出版發行本書。

出版說明

當代中國研究叢書是香港三聯書店和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合作出版的第一個重要項目。

由2009年9月開始，這個項目正式起動，我們將聯合出版有關研究中國當代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和環境等方面的專著、合著、論文集等。這套叢書，設計初期每年出版約十種。除了有選擇地收入浸會大學及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的研究成果外，我們將熱誠歡迎本港及海內外學術界提供資料豐富、有分析、有新見，同時又簡明可讀的有關當代中國包括內地、台灣、港澳及中外關係的研究著作。

期望本叢書可以見證當代中國在經濟、政治、社會各領域的全面發展及其發展路程中艱難跋涉的印跡。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

自序

瑪雅

2004年4月，我發表了第一篇同國內外中國問題學者的訪談文章——《崛起的印度趕超中國？》。寫這篇文章似乎是偶然，但也許是必然，是“瓜熟蒂落”。

2004年初，“印度發展將趕超中國”成為一個熱點話題。在從“印度大國夢”到“印度威脅”的報導中，印度副總理阿德瓦尼“二十一世紀將屬於印度”的宣言，被國內媒體廣為引述。看好印度的學者和媒體普遍認為，印度在未來發展中將不讓中國，主要在於它的“軟件”，即所謂的“體制演進比較優勢”——相對完善的民主制度、行政制度和法律制度，使這個“軟件”大國的發展後勁會更足。

當時，我從美國留學回國不久，憑着在研修比較政治學時對印度民主的瞭解，我意識到，所謂“軟件”之說，相當程度上是意識形態使然的“一葉障目”。這種對印度民主缺乏全面理解和客觀表述的熱炒，難免會對社會大眾產生誤導。於是，我求教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陳峰君教授、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金安平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系王紹光教授和美國喬治亞理工學院納恩國際事務學院王飛凌教授，同他們就印度的“體制優勢”進行對話，寫了《崛起的印度趕超中國？》這篇文章。

文章發表後受到好評，這給了我一個啟發：回國後，由於進入媒體而非學界，被認為“十年一劍”白磨了；採用與學者對話的方式，我可以將傳媒與學術“合璧”，把這種“荒廢”變為收穫。就是說，利用自己的學術背景和媒體平台，通過通俗易懂的口語表述，反映當代頂尖社科、人文學者最關

心的話題，特別是熱點政治話題，向社會各界傳輸有真知灼見的學術理論思想，為政府決策層提供戰略性思路和政策建議。

這本訪談錄收集了我從2004年3月－2009年1月間，與二十位學者的十五篇訪談文章。全書分為改革篇、政體篇、國際篇、社會篇四部分，涉及中國改革與發展的方向路徑、國家產業戰略、新農村建設、中共執政能力、民主政治建設、中國模式、地緣環境與外交戰略、中美關係、社會核心價值觀、中國文化大國形象等話題。

書中有些受訪學者的觀點是相悖的，有些觀點我本人並不認同。但是，作為一個思想開放、有社會責任心的媒體人，我尊重每一位嚴肅認真、真正與我們民族同呼吸、共命運的思考者，願意傾聽他們，與他們平等對話，交換意見。選擇與這些學者對話，是因為，他們的研究不僅具有較高的學術思想含量和政策參考價值，而且是站在對國家和人民利益高度負責的立場上，在堅持批評性的同時注重建設性；是因為，我們民族的利益、國家的進步、人民的福祉需要這種批評性和建設性。這些學者是以“中國立場”在思考，在探究，在求真，出版這本訪談錄，就是要為這樣的“中國思想”的表達和積累做一件有益之事。

中國正在迅速崛起。美國一位學者說，中國之崛起是二十一世紀地緣政治的重要事件。因為中國的崛起，因為這種崛起必將挑戰和改變當今世界政治格局，對於中國來說，今天是一個大時代；對於世界來說，今天也是一個大時代。《詩經》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中國的文明規模、歷史規模和人口規模，只要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對現有世界體系的挑戰和改造就不可避免。這就需要大的國家發展戰略——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文化的，需要大的文明發展藍圖。這就需要在思想上迅速走出“韜光養晦”的偏安局面。這就需要大的戰略思想家，需要來自官方、民間、軍界、學界的出色戰略思想。出版這本訪談錄，也是要為具有國家戰略意義的思想的傳播和普及做一件有益之事。

我懂得大戰略和大戰略思維的重要，緣於我學習生活了十年的美國——美國成為當今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正是因為它戰略上的成功。1947年，美國提出“遏制”（containment）戰略，成為其冷戰外交的主軸。遏制戰略使得美國成功打敗了蘇聯，在全世界樹立起一強獨大的霸主地位。這一寫就的歷史，早已被人們所熟知。我這裏想要說的是，美國戰略上的成功，首先得益於美國人出色的戰略觀。

美國人的戰略觀是極度開放的。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提出大戰略思想的空間向一切有識之士開放。第二，將戰略目標開誠佈公地對外宣佈。這種開放使得真正優秀的大戰略思維能夠脫穎而出，並且在實施過程中不斷被監督、批評和完善。“遏制戰略之父”喬治·肯南當年只是美國駐莫斯科一個公使銜參贊，提出遏制概念六年後，才於1952年出任駐蘇聯大使。遏制戰略最初是肯南1946年2月發自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的電報，後在1947年7月號《外交事務》上發表。這種開放式戰略觀延續至今。2005年3月17日，肯南於美國新澤西州普林斯頓逝世，象徵一個時代悄然遠去。翌日，五角大樓公佈了《美國國防戰略》報告，將美國二十一世紀的國防戰略目標昭告天下。

在當今錯綜複雜的國內國際局勢下，中國要想立於不敗之地，必須有出色的大戰略之道。在這方面，美國人的戰略觀是值得我們思考和借鑒的。

真正優秀的戰略性思維的產生，靠一個領導人的智慧是不行的，靠幾個精英的天賦也不行，要靠開放式、多元化的爭論和探討，靠集思廣益。這就需要開放言論自由的空間，並且建立言論自由的制度性保障。沒有這種空間和保障，就不可能產生比別人更加出色的戰略性思維。這是中國在戰略思維上處於劣勢的根本性原因。

或許，真正的戰略思想家並不多見，但是在開放的話語空間中，戰略性建樹卻常有。不僅如此，大戰略思維既不是政治領袖的專利，也不局限於官場，它更多地來自民間，來自學界。中國古有養士之風，春秋時代即有“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之說。戰爭年代，中國共產黨亦能聽取民間有識之士諫

言——“精兵簡政”這一條意見，就是黨外人士李鼎銘先生提出來的。古代社會尚且問諸鄉野，現代社會的大國戰略更要依靠公共參與。應當發揚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鼓勵和激發有社會責任心的知識份子為國分憂獻策。同時，建立社會各界參與戰略討論的接納機制，將真知灼見及時吸納並付諸實踐。

家國天下。中國知識份子的最大追求莫過於為民族思考，為國家建言。幾年來，我往來於媒體和學界之間，求教中國出色的社科、人文學者，是因為中國的當下和未來，亟需出色的戰略思想以及這種思想的表述與傳播；是因為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國家戰略應當成為全體公民的話題。我知道，雖然“戰略高度”始終是我追求的目標，但以我個人的能力，是不可能實現的。我衷心感謝參與我訪談的每一位學者，沒有他們的思想成果，沒有他們與我分享這些思想成果，就沒有這本訪談錄的產生。這是一個真正的集體智慧的結晶，歸功於它的每一位創作者。

面壁十年圖破壁。在海外十年苦讀，學有所成後，我最大的心願是學有所用。我衷心感謝鳳凰衛視董事局主席、行政總裁劉長樂先生，為我提供了鳳凰這個平台，使我能夠為我的國家盡一己之綿薄。沒有劉長樂先生，沒有鳳凰，我也許沒有機會“研修國家戰略”——這也是我回國幾年來捨小我求大我，堅持不懈，始終不言棄的一個原因。現在，讓我向社會公眾呈上這本《當代中國思想界國是訪談錄》，作為我“博士後”生涯的一份“研究報告”。

2009年3月於北京

序

——從思想的制高點俯瞰

祝東力

世界近代史的總體走向是從西方到東方，這個走向在地理上有兩條路線。一條是“革命”的路線：從英國革命（十七世紀）到法國革命和歐洲革命（十八到十九世紀），再到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二十世紀），自下而上的、暴力的社會革命一波接着一波，巨浪般由西向東傳遞。另一方面，相反相成，從西方到東方還伸展着一條“資本”的路線：環地中海（文藝復興時期）、北大西洋（十六到十九世紀）和亞太地區（二十世紀末至今），依次成為近代世界經濟和貿易的熱點或中心。第一條“革命”的路線主要走陸路，它在解放了相關社會和國家的政治潛力之後，也曾經形成新的異化和壓迫。第二條“資本”的路線主要走海路，它直接導致了對美洲的種族滅絕、對非洲的大規模奴役，但同時也積累了財富並傳播了技術和文明。位於“遠東”的中國，作為最後一個被納入近代世界體系的東方大國，恰好是這兩大政治、經貿路線的交匯點。

1949年是近代以來最重要的歷史拐點，中國從此進入“上行線”。從那以來，我們經歷了最徹底的政治動員，也經歷了最極端的市場動員。英國小說家狄更斯在《雙城記》的開頭說：“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時代，這是愚蠢的時代；這是信仰的時期，這是懷疑的時期；這是光明的季節，這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之春，這是失望之冬；人們面前有着各樣事物，人們面前一無所有；人們正在直奔天堂，人們正在直下地獄——簡而言之，那個時代和當今這個時代是如此相似，因而一些吵嚷不休

的權威們也堅持認為，不管它是好是壞，都只能用‘最……’來評價它。”這段描述法國大革命和英國工業革命時期的經典段落，用來表述1949年以來中國的許多方面，應該也是貼切的。

1949年迄今的六十年，時間節奏彷彿突然加快，使這個相關時段成為一部“濃縮的歷史”。在體制和觀念不斷轉換、更新的同時，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以年均百分之七—百分之九（按照不同的計算方法）的速度持續擴張。這種以整個國家為單位的長時間的“強行軍”，在世界範圍內也是罕見的。它不但使中國走出了近代陷阱，而且使中國日益成為全球政治、經貿的焦點或中心，但同時，也造成了各種尖銳的矛盾、困境和危機，此起彼落，層出不窮。換句話說，正是由於世界近代以來兩大政治、經貿路線在東亞大陸的交匯，正是由於古典中國向現代中國的急劇轉型，以及正是由於當代中國在動盪中的成長——使歷史和現實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全部重大問題，最尖銳、最密集地出現在中國的思想空間。“中國問題”期待着“中國理論”或“中國社會科學”，這使得中國思想界在全球化的時代宿命般地獲得了一個特殊的視角——進一步，也許可以說，正是上述千年不遇的特殊境況，使中國在整體上佔據了一種特殊的“戰略高度”。

本書正是對上述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重大問題的回應。值得注意的是，集中在本書中的有一批可能是中國當代最優秀的戰略思想家和相關領域的專家。說起來，他們大多也許還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那場思想—政治運動播下的種子。從年齡來看，這些被採訪的學者大多出生於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這正是當年“紅衛兵”和“知青”的一代。

在古今中外的學術思想史上，這也許是非常特殊的一代人。例如這裏的王紹光、溫鐵軍、胡鞍鋼、曹錦清、秦暉、高梁、黃平、張文木、房寧、徐友漁、王長江等，他們正值青春年少，便風雲際會，經歷了大時代的轉折和動盪，大字報、大辯論，造反、串聯，秩序瓦解、權威掃地。“紅衛兵—

“知青”一代在他們自我意識和社會意識成長或萌芽的幼稚時期，就遭遇了中國政治、世界政治的大課題，從而獲得了一種開闊的大視野和問題意識。以後，不論是下鄉插隊還是進工廠或者參軍，又使這一代人積累了底層生活的經驗，並從這裏轉而重新認識社會，認識中國和世界。也就是說，1960年代的政治雷霆曾經擊中了這一代人，使他們政治早熟；底層的磨練則使他們獲得了生活的重量感，刷新了他們以往的書本知識，又構成了他們未來書本知識的基礎。這種特殊的經歷，在整體上明顯地使“紅衛兵—知青”一代，既區別於他們之前1930—1940年代出生的一代，也區別於之後1960—1970年代的一代人。

其實，本書的中心人物——採訪人瑪雅，也是這代人中的一個。瑪雅從小在北京西郊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等軍事學院（今國防大學）長大，受那個時代的感染，不愛紅妝，剛滿十五歲就參了軍。退伍後，進中央機關工作。1990年代初，當時是中直機關副處級幹部的瑪雅一個空中轉體一百八十度，辭去公職，先到澳洲，後到美國讀書，取得了美國喬治亞州立大學的政治學博士學位。

瑪雅是在1989年之後出國讀書的，1992年剛到美國時，又正遇上美國總統大選。當時的中美政治對峙、東西方政治傳統的差異、美國民主與共和兩黨之間的激烈選戰，一下子把她擲於幾種不同的政治制度、政策取向和意識形態話語的衝突對立中，促使她選擇了政治學專業，主修國際政治、比較政治和美國政治。在系統研究西方民主政治理論和中國民主發展的政治、文化、經濟條件的基礎上，瑪雅完成了她的博士論文《中國民主進程中的國家與社會》（*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s Democratic Transition*），並於2003年在美國出版了這部英文論著。回國後，瑪雅供職於香港鳳凰集團旗下的《鳳凰週刊》，往來於北京、深圳、上海、香港之間，穿行於不同專業的學者圈中，漸漸成了國內學術思想界活字典式的人物。

本書中的被採訪者不全是“紅衛兵—知青”一代，也包括1960年代出

生的著名學者潘維、毛壽龍等人，但的確是以“紅衛兵—知青”一代為骨幹——書中即使是少數1960年代出生的學者，也處於那一代人的強大影響之下。書中以問答的形式討論了當今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諸領域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例如關於中共執政能力、中國民主、中國政體，關於中國改革、產業政策、三農問題，關於地緣環境和中國外交戰略，還有社會核心價值觀，等等。這些訪談，在思想光譜上涵蓋了新國家主義、新左派、鄉建派和自由主義等。在方法上的特點則是，在着眼於長遠和全局的同時，又講究細節和資料，也就是，既具備戰略眼光，又注重專業知識的根基。由於上述原因，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這些訪談所針對的問題、所表述的思想恐怕都不會過時。同時，這樣多重大問題和這樣多重量級學者集中在的一本書裏，在出版界也是並不多見的。這毋庸我贅述。

需要說明的只是，本書所有訪談均作於2003年以後，所包含的思想則大多醞釀、形成於1990年代中後期。從中國當代學術思想的演變看，自“文革”結束到整個1980年代，是傳統的革命價值觀和世界觀被全面改造的時期，因此文學、哲學等人文學術成為當時知識界的顯學——所謂1980年代的“啟蒙主義”，其實質就是在價值理想和象徵符號的層面上批判國家體制和權力，而為日後“資本”和“市場”的支配地位，提供思想準備和輿論環境。而在整個1990年代，文學、哲學等迅速邊緣化，經濟學取代人文學術，佔據知識界的首席——其根本原因在於：由國家權力主導的市場經濟逐步推進，與宏觀經濟增長相伴隨的赤裸裸的利益瓜分已成為1990年代的主題。但是，另一方面，新的思潮，包括對改革開放的總結和反省，也醞釀並形成於這個時期。

2003年以來，“延長的四十年代”漸漸結束，旨在調整發展模式和利益關係的社會政策次第出台，人們期望，這將是從1949年以來前後相繼的兩個“當代中國”的某種整合。相應地，個別學科一枝獨秀的局面亦不復存在，片面的知識和視野將讓位於綜合的社會科學的觀察和思考——這也正是本書

的內容和特點。

當代中國的版圖面積幾乎等於整個歐洲，人口規模則接近歐洲人口的兩倍。悠久的文化傳統和創造力使其一向成為世界史上為數不多的主要文明類型之一，源遠流長，直至晚清。這一巨大的文明遺產必將發生深刻的歷史性影響。

自近代以來，中國已經歷了“救亡”和“發展”兩個階段。其中，“救亡”階段的結束大體以“兩彈一星”研製成功為標誌，從此，中國由1949年以後的“準戰爭體制”逐步過渡到“和平體制”，由“救亡”階段漸進到“發展”階段。

那麼，目前這個“發展”階段將結束於何時？在它之後，是否還存在第三個階段？放眼未來，“發展”階段也許將結束於2020年到本世紀中葉之間的某個時期。屆時，中國將基本完成工業化，在持續近百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和現代化進程之後，中國將可能獲得這樣一種基礎——在這個基礎之上，它將進入一個全面的“創新”階段。也就是說，在政治體制、經濟模式、社會架構、城鄉關係、生態環境和文化觀念諸方面，中國都可能創造出新的形態，這是一種新的文明形態，包括它的經驗和教訓，都可能成為世界上大多數非西方國家和人口持續發展的範例和參照。

假如站在那樣一個歷史時段回望我們這個時代，將會發現，2003年以來是一個發展模式和社會利益的重要調整期。那時的主流思想將起源於我們這個異見紛紜、思想交匯的時代，將從我們這個時代，包括從本書中，找到它們的萌芽或胚胎。

2007年6月10日於北京

目 錄

自序.....	瑪雅	1
序——從思想的制高點俯瞰.....	祝東力	5

改革篇

胡溫改革：新共識、新走向	
——專訪王紹光	2
胡溫五年實證評估報告	
——專訪胡鞍綱	17
改革開放要堅持自主創新的道路	
——專訪高梁	32
新鄉村建設的思考與跋涉	
——專訪溫鐵軍	48

政體篇

中共執政能力面對挑戰	
——對話黃衛平、毛壽龍、潘維、王長江、王紹光.....	76

史觀與共產黨的執政地位

——專訪曹錦清.....90

中國民主的三個視角、三種表述

——問答房寧、潘維、楊鵬.....115

中國人的民主價值觀實證研究報告

——專訪史天健.....139

共和國一甲子探討中國模式

——專訪潘維.....161

國際篇

中國在21世紀上半葉的國際環境與戰略選擇

——專訪黃平.....188

地緣政治中的世界變局與中國前景

——專訪張文木.....214

崛起的印度趕超中國？

——陳峰君、金安平、王紹光、王飛凌對中印的比較分析.....231

烏克蘭大選的美國攻略及中國思考

——房寧、秦暉、徐友漁、王紹光對話“顏色革命”.....244

社會篇

重建我們民族“精神的骨架”

——潘維談中國社會核心價值觀..... 258

中國：文化大國的興衰與重構

——專訪祝東力..... 286

改 革 篇